

『新民報』に関する研究 (続き)

《新民报》研究 (续)

—— 对中日战争不同阶段社论的分析

陈 昌 凤^{*1} 刘 扬^{*2}

Analysis of Xinminbao Editorials in Different Phases of Japan-China War

CHEN Chang Feng^{*1} and LIU Yang^{*2}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ditorials in Xinminbao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ditorials and the war process. The result is that any press was a major part of the war machine. During the invasion war, there was no really independent press. Instead the press became the war-driven machine, helping the invaders to rein the Chines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Key Words: Xinminbao, Journalism in Japan-occupied area, Analysis of editorials

摘要: 本論は過去の研究を基礎に、歴史的な時期区分と、具体的な内容分析を行うことによって、『新民報』社説のスタイル、内容の変化と戦局の変化との関連を重点的に分析した。これによって、当時のジャーナリズムが日本の侵略総力戦の一構成部分であり、独立したジャーナリズムは存在せず、それは侵略者に奉仕する宣伝道具としてのみ存在し、人民の思考を麻痺させ、侵略者の思想統制に協力する道具になっていたことを証明した。

キーワード: 『新民報』、日本占領区のジャーナリズム、社説の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分期与文本案例的方法，集中分析了《新民报》社论形式、内容的变化与战局变化之间的联系。从而证明报业是日本侵略战争总体战的一部分，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根本不存在独立的报业，只存在为侵略者御使的宣传工具，成为麻痹人民思想、协助侵略者进行思想控制从而实现统制的工具。

关键词: 日伪《新民报》，沦陷区报业，社论分析

一、过往研究回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华北地区被日本军队占领，成为沦陷区。但沦陷区内的报业运转却始终没有停顿，在日本占领军的管制下，华北地区报业始终保持出版，一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战败为止。其间华北地区仅中文报纸就出现过《新民报》、《武德报》、《实报》、《民众报》、《庸报》、《华北新报》等十余种报刊。日本占领期间北平还建立了中华新闻学院，出版了新闻学教材《新闻学集成》等，形成了完整的为日本战时新闻统制服务的体系。虽然占领状态持续了八年有余，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中日关系史上难以磨灭的一段痛苦经历，但出于各种原因，有关沦陷区报业研究却少之又少。

*1 北京大学ジャーナリズム・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院

*2 北京大学ジャーナリズム・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院大学院生

在中国现存的新闻是教材中,多则数十页,如堪称目前中国大陆新闻史学大典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对沦陷区报业的介绍也不过百页。而且目前研究多数集中在东北和华南沦陷区报业,具体到华北地区报业的几乎是一片空白。这显然是与历史真实情况不相匹配的。

本研究力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集中力量研究华北沦陷区新闻业的状况,尽力还原这段历史,弥补现有新闻史书的不足。本研究计划分为报纸内容、报业政策、报业经营、新闻教育等四个部分展开,搜集一手材料、进行客观分析,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在上一年度的《日本占领与中国新闻事业》课题(代表卓南生)中,已完成的有《南京国民政府宣传部的新闻论及其治下的报纸》、《〈华北新报〉研究》和《〈新民报〉研究》。第一篇论文从通过对南京伪政权报纸主管部门的机关刊物分析从总体上把握了伪政权的新闻理念、方针以及随战局变化而做出的调整。后两篇论文则选取伪政权统治下华北地区有先后继承性的两份最主要报纸,结合实例具体分析了两报的版面内容、指导方针。《〈华北新报〉研究》更为强调日伪新闻体制下报纸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矛盾性。《〈新民报〉研究》则更多地关注日伪报纸社论与宣传技巧。三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地理上南北相对、在时间上前后呼应、在着眼点上宏观与微观兼顾。

过往研究基本符合国内权威新闻史大典——《中国新闻通史》对这一时期沦陷区新闻统制政策的论述:

日本侵略者在它所占领的中国沦陷区实行新闻统制政策,将新闻事业置于其法西斯的军事管制之下。具体措施有四项:一是扼杀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宣传,实行新闻封锁;二是强化日本在华的新闻宣传势力,建立日本人在华新闻宣传阵线;三是建立法西斯新闻统制机构;四是全面垄断新闻通讯与广播事业。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日本侵略者严密控制了沦陷区的新闻事业。¹⁾

三篇论文以伪国民政府统治区域为研究对象,具体化了过往的论述,更为真实详细。同时,与已经有较多研究成果的伪满政权新闻统制研究形成呼应,使沦陷区新闻研究更加完整。

对《新民报》上一阶段的研究讨论了社论内容的变化与宣传伎俩。但作为历史性研究缺乏适当的历史分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新民报》如何反映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受何种历史背景影响等问题得不到较为清晰的反映。因此,《新民报》研究有待在此方面进一步深入。

二、本文的研究目的

意识操纵是通过为人的行为编制程序来对人施加精神影响的一种统治方法。这种影响用于人的心理结构,是暗中实现的,其任务是按照权力当局所需要的方向改变人们的意见、愿望和目的。²⁾

舆论是意识操纵的重要工具,而在中日战争时期,报纸是最重要的舆论工具之一,社论又是一报之首。

卓南生教授的研究中提到,南京伪政权“中央报业经理处”称社论是报纸的“司令塔”,并规定其在战时的任务为“直视现在,设计未来,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指示民众现实行动的具体目标”。³⁾

对《新民报》社论的研究可以集中反映《新民报》的舆论导向,从而窥见侵略者对沦陷区人民的意识操纵。从而证明沦陷区报业是日本侵略战争总体战的一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日本对华战争服务的。正如郭秀峰在《怎样从事本年的宣传工作中》说到:“宣传工作,在平时已经是很重要,一到战时,它的使命,当然就格外重大了。孙子兵法上说:‘攻心为上’换一句近代术语来解释,便是所

谓思想战或宣传战。”⁴⁾ 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办报目的决定了沦陷区一定不会产生一份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报纸。

三、历史阶段的划分与研究方法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中日战争预想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⁵⁾

此后中日战争的进程都映证了这个战争阶段预想。比如《中日战争史（1931-1945）》一书将战争分为五个阶段：1937年7月7日——1938年11月3日，战争爆发初期日本侵略者妄图速胜阶段；1938年11月3日——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战争进展不顺，进入相持阶段；1941年12月8日——1942年下半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1942年——1944年初，日本退守“绝对国防圈”；1944年后至战争结束，“决胜年”时期，日本侵略军作最后挣扎，直至失败。基本符合毛泽东提出的三个阶段。⁶⁾ 故本研究采用三阶段划分方法。

在战争分期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历史背景分析，报业政策分析，辅以社论文本为佐证的研究方法，力图证明《新民报》社论是以战争要求为己任，随战争不同阶段需求摇摆的产物，是日本侵略中国乃至亚洲总体战争的一部分。

四、《新民报》在中日战争不同阶段社论导向的分析

1. 妄图速胜阶段

从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至1938年10月武汉陷落一般被视为日本侵略军妄图速胜阶段。这一阶段，日军妄图在短时间内攻克中国，然后实现“北上”进攻苏联计划。

由于战争初期，中国军队的迅速溃败大大增强了日本侵略军的野心。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

中国新政权之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从而不容有任何与国民政府谈判的余地与考虑。

日伪《新民报》1938年1月1日创刊，几乎与近卫第一次声明同时。在近卫声明一周后，《新民报》就推出了题为“日政府不以党人为对手”的社论。

对手，对策，对等云者，为国际法上之外交术语，对策者，以国策对某种政策而言，对等者，以国际间之地位而言，与派遣使节时见之，对手者，与他之国家或交战团体，承认与媾和缔结某种条约时，彼此以为对手与否之标准，是对手之关系，在国际间，举足轻重矣。

.....

（日政府不以党人为对手），此种声明，在事实上言之，诚属至论，在外交上论之，亦为当然之步骤也，兹申言之。

.....

党人欲一手遮尽天下人之耳目，乃司马昭之用心。人皆见之矣，国民对新政府完全信赖。对党人则全国唾弃，苟与党人结非法条约，与国民有切肤之关系，国民万难承认，日政府不以党人为对手者，诚属当然，就党人联俄容共之政策，国人已了然于中，而知所危也，扫除东亚和平之魔障，国民安居乐业，求之不得，苟日政府筑成防共之大功，决不应与党人对手，以慰全国国民之切望也。⁷⁾

《新民报》竭尽唱和之功，从国际到国内的各个方面贬低国民政府，甚至不把国民政府看作与日本作战的对等实体，为近卫第一次声明的合理性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凡是与国民党、国民政府相关的事情都要在社论中遭到批判，在否定当时中国合法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彻底摧毁中国。正如《日本占领时期〈新民报〉研究》曾观察到，在三民主义、孙中山等问题上，《新民报》存在着明显的前后态度不一致现象。在战局有利的条件下，《新民报》对国民政府的进攻不留一丝回旋余地。比如在1938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之际，《新民报》就发表社论，全面攻击国民政府，推卸战争责任。

今后趋势，明若观火，党政府上面，虚伪宣传已是国民信仰，恣情杀戮，内部渐起动摇，败战结果，国际救援绝望，捉襟见肘，经济源泉中斩，一切的一切，均丧失政府的价值与意义。况昔日所视为护符的三民主义，今已尽为国民撕毁，铁索樊笼，不复有用。再就军事上面观察，汉口虽大言死守，然疲兵残匪，绞作一团，手忙脚乱，何能济事？预料陷落之期，当在目前。此党府果然尚有余力迁滇，其能保持地方军阀之姿态，偏安边塞者，已属党人精心杰作，然亦难得矣。新政权方面，基础牢固，枝干已丰，友邦大力支援，人民热心向化，发扬整备，一日千里，益以新民主主义之润泽培育，清扫党人邪说秕政，恢复中国王道思想，使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得以继续为中国传统之美德，五旗结为一家，天地重见明朗。语云，邪不侵正，正可制邪，党政府与新政权消长生灭之机，尽蕴蓄于此中矣。展进中国之未来，当作如是观也。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划了东亚的历史，事件一周年的结果，新了东亚的大陆，从此四万万五千万之亲爱同胞，三百余万里之锦绣山河，又在卿云。

在此，三民主义都“不复有用”，唯有“友邦”才能帮助“向化”人民，整顿中国国内事务，恢复中国传统美德，丝毫不留余地地抬高侵略者地位，尽力贬低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

此外，在这一时期《新民报》的社论主要内容是粉饰日本军队的侵略。比如1938年1月18日的社论“日对华根本方针之声明”。

为特达正义与重大之目的，方法有缓急之别，手段有软激之分，苟有障碍与目的之进展，妨害于方针之正向者，虽处于急切之方法与激烈之手段而不顾，非英明果敢者，决难处之，如意之与亚比西尼亚，德之与凡尔赛条约，西班牙之国民革命，中国之汤武征诛之类，皆其著者，就今之中日事件，在莫名世界大局之危机与日之根本方针之国策者，自难有充分之了解，与彻底之认识。

似乎日本的侵略行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正义之举，被比作“汤武征诛”，日本成为大智大勇的“果敢者”。同时在这样的类比中也合法化了德国与意大利在全球的侵略行为。在接下来的一段中，日本天皇又被描绘成对中国“怒其不争”而“宿夜軫念”、殚精竭虑的“明君”，把赤裸裸的侵略美化成促进中国反省的“良苦用心”，把威胁东亚地区和平的责任无端推给中国。

日明治天皇之诏谕曰：“以日本帝国与中国之协力提携，确保东亚之安定，以便举共存共荣之实，此事朕宿夜軫念，无时或忘，惜中国深不解帝国之真意，滥构事端，以致遂有今日之事变，（甲午）朕深憾之，今朕为军人排除万难，使继尽其忠勇，其唯一目的，无非为促进中国之反省，希望急

速确定东亚之和平”，此日对华之根本国策之方针，故欲明了和认识对东洋政策之关系，应于此谄谀，加以深切之研究。

.....

最后，社论又把对华侵略殖民比作独立国家间的结盟，日本在东亚已经做的与将要做的与美国在美洲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侵略的行径被曲解成类似区域化合作的行为。在歪曲事实的类比下，日本要成为东亚唯一盟主的要求变得顺理成章。

查南北美诸邦，以美国为盟主，而发起之泛美大会……然东亚者，自宜由东亚之主人而主理之，毋庸外人之置喙，方为合理，经他之国家干涉之，势必开其乱源，与养成祸根也，东亚之和平，将永无望

.....⁸⁾

但战局的变化不得不让日本侵略者做出战略上的调整。战争初期顺利的进展让侵略者误以为可以迅速夺取长江重镇武汉，从而彻底灭亡中国，实施北上计划。《新民报》对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也有反映。从1938年7月起，《新民报》就开展竞猜活动，号召读者预测武汉的沦陷日期，但这样的竞猜等来的却是对武汉的久攻不下，直到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才费尽力气攻进武汉，这个结果让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放弃北上计划，从而进入中日战争的相持阶段。

2. 相持阶段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想方设法拉拢中国当地既存势力，把中国拉上为日本战争服务的战车，从一味地侵略转为“建设”。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二次声明，宣称日本的目标是建立“日满华三国合作”的“东亚新秩序”，宣称“如果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如该政府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则帝国决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溃为止”。“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强调要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的同时，也要求和“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从中可以看出，与上一阶段相比较，日本侵略军对国民政府的策略、态度都发生了变化。从不给国民政府留一丝余地的进攻转变为有条件的吸收和利用。对于沦陷区的人民，侵略者也从一味的压服转变为更为隐蔽而多样的手段。1939年1月4日《新民报》社论“新年后之本报”中最后写到：

过去的意念，不过是在军事时期，一切“消息”，“论文”皆注意于军事方面，只做到新闻速确，论旨正大为已足。然今后的事业，应随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大业，共同努力，是多方面的工作，同时开端，一切责任，俱与以前不同……⁹⁾

根据该篇社论，似乎从1939年初开始，中国从战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以该论调麻痹中国沦陷区人民，频繁使用“文化”、“信念”、“事业”等，通过这样的欺骗伎俩，把沦陷区人民纳入到为侵略战争而不断“建设”的生产流程中，是日本军队在华的侵略得以维持，以便为其在亚洲更大范围内开

展侵略战争提供支持。“新年后之本报”一文还写到：

本报以奉行“社是”为首要：社是谓“我新民报享受新民主主义的生命，应运而诞生于苏生中国之新民主主义的新政下，自任以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之先锋，乃信奉之，宣扬之，而实践躬行此主义者也，基此信念，本即为全国之喉舌，促新民之奋起，奋力于，真正舆论之确立，期以与全体国民，翼赞新政，贡献新中国根本道义之复兴与明朗天地之建设，并亚洲全民族的协和，而坚强拒防人民阵线，以资奠定世界之新基础，开辟新世纪之新道路。此本报同仁为此主义之使徒，忠尽血诚力达新民主主义之完成后止者也。”

.....

事业局尤为本报之特色，本报非以盈利为目的之新闻事业，凡关于慈善公益，社会教育，儿童妇女等事业，均由事业局专责办理，客岁成绩，不无可观，今后当再接再厉的，以与社会各方面协力，展开服务工作，以大本报为民众服务之最高目的。¹⁰⁾

可见社论不再像“速胜”阶段时来得气势汹汹，大讲“苏生之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亚洲全民族协和”、“为民众服务”等等，似乎给了沦陷区人民自主的权利和希望。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报社等机构还要发挥特别的功能，比如上文提到事业局要统管“慈善公益，社会教育，儿童妇女等事业”。这种类型的社论欺骗性最强。但行动最终还是要暴露日本侵略者的本质。奴化教育，文化洗脑仍然是《新民报》社论的主要功能，主要是向沦陷区人民灌输“日本民族优越”的思想。比如1940年2月11日社论“庆祝日本纪元二千六百年”

考查历史，亘绵数千年，地里纵横数万里，而求得一皇纪治国，万世一系之国家，为今日的日本国体如此。而且有悠久二千六百年的历史，至今更日新月异的锐进，蒸蒸日上的发展。实可谓世无与匹，万载唯一！

考察东亚大陆，建国早者，若巴比伦、波斯，印度等，而今若何。近日完全独立之国家，唯有远东的日本，满洲，中国与泰义四国而已，而中国与泰义的景象又若何不言而喻，东亚在今日足以首屈一指，且为黄族争光荣者，以唯有日本一国而已，号称之世界五大民族，今被白种人吞没者有三，五大洲之锦绣河山今被白种人占据所余无几。

.....

总之，日本国家及民族性，足为东亚国家及民族之模范，今立于“指导方向”之地位，而努力与建设东亚新秩序，值此二千六百年建国大纪念日，东亚民族宜竭诚庆祝，并彻底觉悟认识日本之优点与夫日本历朝所抱之伟大“东亚和平”之大信念，起而追随之，在盟邦领导之下，共赴建设东亚之大业，日本皇纪万岁，东亚福祉无疆。¹¹⁾

文章用尽吹嘘拍马之能事，尽显谄媚，为侵略者歌功颂德。以“黄族”模糊日本侵略战争，用欧美殖民者的劣行转移人们对日本军队侵略的仇恨，宣传方法诡秘。该文还有一段特别引人注目，它指出：

在日本精神的许多特征之中，最著者，为对于输入的一切思想、文明“导给方向”一事，因此日

本才伟大起来，与此完全和会合了无数的支流使其水尽向东洋大海。

日本战时体制下，舆论导向控制成为最应被亚洲其他国家吸取的东西。严格的舆论操纵不仅不应被批判，还应被视为法宝被学习，如此颠倒黑白也是舆论操纵的一种方式。

日本侵略军北上不成，便转而南下，日本在东南亚的侵略使它与欧美国家的冲突愈演愈烈。为了应对更大范围的战争，日本侵略者加强了对中国沦陷区的统制，使其成为战争基地。日本大本营将华北分为“治安地区（敌后区）”、“准治安地区（游击区）”、“未治安地区（解放区）”，在巩固“治安地区”的同时，用蚕食和扫荡两种方法减少“准治安地区”和“未治安地区”，从而保证战争基地的稳固。日军先后在华北占领区进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两次“清乡”。每一次运动，《新民报》都会相应发表社论，积极配合侵略战争，从1941年3月21日至4月8日连续刊载有关“治安运动”社论，如“个人责任与治安”、“生活与治安”、“华北治安之重要”、“治安强化与共荣圈之建设”、“国人对治安应有之认识”等等。日本在舆论上也做好了与英美作战的准备，1941年3月3日社论“宜速建立‘道德重心’”写道：

概自欧美功利思想者侵入东方以后，则东方之“本位文化”受有至大之摧残，道德观点亦随之薄弱，幸友邦日本乃保持东方固有道义之大精神而不失，可作今日复兴之借镜……

……日本国家上下一体，严格忠实奉行孔孟之道为心，荒道稚郎子皇子的自杀，即为悲壮的证明，故孔道使日本国民道德向上，特于德川时代孔道成为国民道德并政治生活的至要指导原理……中国近来失去孔道精神，仅存躯壳，日本则得而保存并身体而力行。

总之，中国今日已到不可救药之地步，兴科学效西法，结果国势日蹙，勾进赤白帝国主义当前之清共为目标之建设大业，更非孔道大兴，无以拒绝赤祸之蔓延，正人心，学风俗，挽救危机，舍急树“道德重心”将无以自救也，勸孔道会会众之努力进展，勉国民之一致尊崇，孔道确立，中国有望也。¹²⁾

一方面社论对英美大加贬低，却绝口不提日本崛起乃是向西洋学习的结果，反而说中国国运不济是因为“兴科学效西法”的恶果。社论借“弘扬”孔孟之道来强化日本侵略的“合理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英美的抨击几乎成为社论的主要内容，根据《日本占领时期〈新民报〉研究》一文统计，从1942年至1944年《新民报》停刊共有关于英美社论74篇，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二字在社论标题中都被加上反犬旁，以示英美犬狗不如。

从中，再次可以看出，随着战局的变化，《新民报》社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做出了相应的调整。

3. 战略收缩与濒临失败阶段

1943年日本大本营《昭和18年度陆军作战指导案》中决定，首先迅速完成南太平洋方面的作战，确立“自强必胜”的战略态势，再准备以后的作战。实际上是日本战略已由攻势转为守势。

1943年9月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了《今后采取战争指导大纲》，决定“帝国以今明两年决定战争的格局为目标，继续摧毁美英攻势，迅速确立必胜的战略态势，急剧增加决战力量”。决定放弃西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东部、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等地，退守西起缅甸、马来亚，经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西部，在延伸到西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直至

小笠原群岛、千岛群岛的“绝对国防圈”。

“绝对国防圈”的提出标志着日本战线的回缩与全面溃败的开始。1944年成为日本的“决胜年”，从1944年1月1日起，所有的《新民报》都被印上“决胜版”三个字。各地报纸也先后采取了减张、隔日出版、缩小版面直至停刊的各种措施，以应对败局将至所引发的物资短缺。《新民报》也不例外。

虽然日伪报纸纷纷走向终结，但报纸的社论工作却不曾放松。1944年4月1日出版的《新闻月刊》在“我们的主张”中写到：

一大消耗战的第三年自己展开在我们的眼前，印制报纸所需要的纸张，油墨，铅块，机器等消耗资材，以及机器设备等势必要极度节约，自不待言。

但是，报纸宣传的必要项目，实包括——全世界的战争消息，全东亚各国奋迈建设的消息，中国本身之思想，产业等诸般对策，为了确保民生以再建真实的东亚的中国，一切报道与讨论，解说，其普及的需要是漫无限制的。¹³⁾

但与相持阶段的社论相比，“决胜”阶段的社论明显缺乏系统性。比如在相持阶段，报纸常会根据各种运动的需要安排一周、甚至数月的连续社论，比如“强化治安运动”、“兴亚运动”等。相比较“决胜”阶段社论比较凌乱。以下是1944年2月《新民报》各期社论标题，从中可见一斑。

1944年2月1日 中共对妇女的混乱政策

1944年2月2日 黄河治水

1944年2月3日 中立之难

1944年2月4日 中华民族性之恢复

1944年2月5日 大东亚政治的攻势

1944年2月6日 (空)

1944年2月7日 渝伪经济之来源

1944年2月8日 清算只靠天

1944年2月9日 东亚之路

1944年2月10日 如何增强战力

1944年2月11日 庆祝“纪元节”

1944年2月12日 葛直新德里

1944年2月13日 必胜不败之真理认识

1944年2月14日 反轴心反动之胎动

1944年2月15日 贫寒学生可废学耶？

1944年2月16日 建设明朗之华北

1944年2月17日 效法日侨

1944年2月18日 十亿责任之再检讨

1944年2月19日 警政会议之展望

1944年2月20日 铲灭奸商！

1944年2月21日 改进农村须择重点

1944年 2月22日 京市交通问题
1944年 2月23日 中共之欺骗政府
1944年 2月24日 华北建设与中共
1944年 2月25日 盟邦决战之底蕴
1944年 2月26日 大检举之后
1944年 2月27日 中共自相矛盾
1944年 2月28日 渝方实力之于英美
1944年 2月29日 欧洲轴心之合作力量

与此同时，社论内容更显空泛，比如1943年12月24日社论《如何度决胜年》

岁月不居，流光如驶，转瞬又届岁末，回忆一年世界发生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尤其是在东亚，正是天地改造，宇宙更新，民族解放，宦海镜清，一种蓬勃奋兴气氛弥漫全域，瞻彼将来之前途，尚有决胜之大战，正待吾人之努力赴之，扫荡英美残敌，使彼不留残余渣滓于东亚大陆，完成吾人未尽之功，畅达吾人素怀之志，可谓：“任重一而不得不为‘道远’”，责任无限也，联想前方作战之斗士，茹苦含辛，披星戴月，历战沙场，与敌交锋，其刻苦精神为东亚民族求生活之热情毅力，立于后方兵站基地之民众，值兹新年能不坐卧不安怀念忠勇奋力杀贼之皇军乎？¹⁴⁾

形式上，故作儒雅。内容上，都是陈腔滥调、空话连篇。足以反映出临近彻底失败时的智困技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言辞“豪迈”的《新民报》却没能度过“决胜年”，于1944年4月30日彻底停刊，5月1日并入《华北新报》。

五、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新民报》的社论是随着战局的变化而变化的，从进攻阶段的恣意骄横，不给对方留有任何喘息余地，到相持阶段假意建设、试图拉拢，又到濒临失败时所流露出的语言空洞、安排混乱，都证明这些社论以及这份报纸都是战争的一部分，都有着战争的性质。

《新闻月刊》曾有这样的“主张”，

报纸使命之重大，和它的存在价值当然一致。如果不一致，便是由于新闻记者对于其重大使命没有理解，对时代之适当的认识并未充分之故。¹⁵⁾

这句话是句实话。值得思考的是，日伪报纸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任何一份报纸都要符合它所处的社会条件，这是报纸生存的首要条件。在日本侵略战争的条件下，存在的报纸必然成为日本战车上的齿轮。徐锡庆在谈到总力战与报纸的关系时说到“把同一职业阶层的力量团结起来，集中起来，就是总力战下许多的支队，自然新闻记者群的是许多支队中发挥战斗威力的中坚层，在总力战的前提下，新闻记者要实践战时报道的工作，譬如新闻记者是士兵，报社与电讯社就是若干士兵集合的报道支队。”¹⁶⁾这段话彻底交待了战时新闻工作的本质。因此，在新闻统制政策下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新闻事业，只存在为侵略者御使的宣传工具，成为麻痹人民思想、协助侵略者进行思想控制从而实现统制的工具。

在本次研究中,当作者回顾战争的不同阶段,都可以发现日本侵略军根据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口号、不同的战略。比如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东亚新秩序”概念。当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将战争命名为“大东亚战争”。当日本侵略军进入守势后,大本营又提出“绝对国防圈”概念。最后,日本侵略军称濒临失败、垂死挣扎的年月为“决胜年”。可见不同时期,不同的背景,提出了不同的战略,产生了不同的词语,这是足以引起新闻、历史、修辞等学科学术兴趣的事情。因此本研究也有待更为细化。

注

1) 方汉奇 宁树藩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868页。

2) 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39页。

3) 伪国民政府宣传部中央报业经理处编:《新中国新闻论》,1942年,第89-94页。转引自卓南生:“南京伪政权的新闻论及其制下的报纸”,选自程曼丽主编《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332页-333页。

4) 郭秀峰:“怎样从事本年的宣传工作”,《新闻月评》1943年1月1日,第3页。

郭秀峰原为伪《中华日报》总编辑,1939年调汪伪政权任职,主管宣传,最高任职为伪政权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

5) 毛泽东:《论持久战》。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462页。

6) 胡德坤:《中日战争史(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7) 《新民报》1938年1月22日 第3版

8) 《新民报》1938年1月18日 第3版。

9) 《新民报》1939年1月4日 第3版。

10) 《新民报》1939年1月4日 第3版

11) 《新民报》1940年2月11日 第2版。

12) 《新民报》1941年3月3日 第1版。

13) 《新闻月刊》1944年4月1日 第1页。

14) 《新民报》1943年12月24日 第1版。

15) 《新闻月刊》1943年4月15日 第1页。

16) 《新闻月刊》1943年4月15日 第2页。